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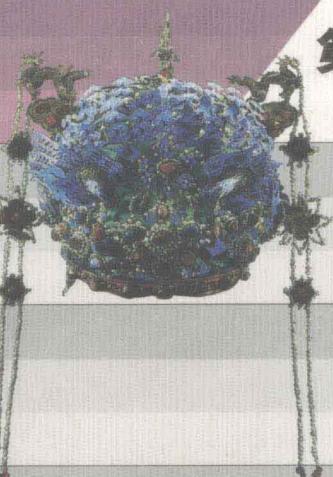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1 典

【历代文化沿革】

明代文化志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商

传
撰

中华
文化
通志

第 一 典
【历代文化沿革】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明
代
文
化
志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眇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明代文化志

作者简介

商传，1945 年生。1968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81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明史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著有《明十三陵》、《永乐皇帝》、《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副主编）。发表论文多篇。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此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讨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书为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典》中的一部。全书以新的志书体记写了有明一代文化之大端，在分类记述明代文化典志与大事的同时，着重强调了明代文化的主要内在特征。明代曾经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创造出灿烂的一页，但它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时代，这一时代特征决定了明代文化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盛世的汉、唐文化，明代文化既有其对传统延续的一方面，也有其反传统变化的一方面。因此，明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它前后时期的明显不同，即晚明文化的变异。本书以动态述史的手法对于明代的文化制度、政治与文化、经济与文化、社会与文化，以及各阶层的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明代文化的学术专著。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总论	3
第一节 明代的文人与文化趋向	3
一、元末明初的学风	3
二、文官政治与官僚文化	11
三、社会转型与文化变异	15
第二节 明代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23
一、明代文化特征	24
二、明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34
第二章 明代文化专制	40
第一节 文字狱	41
一、贺表案	41
二、诗文案	44
三、书院讲学案	52
第二节 取士与文化专制	56
一、“士不为君用”	56

二、科举之兴废	60
三、科场案	63
第三节 书籍之禁毁	70
一、《孟子节文》	70
二、方孝孺著作之禁	73
三、禁书案	77
四、官修史籍与正史之篡改	83
五、《大明律》与《大诰》	88
第三章 多层文化特征	95
第一节 特定的文化分野	95
一、宫廷文化	97
二、宦官与宫婢文化圈	125
三、趋向没落的皇室贵族文化	137
四、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及其发展	149
五、士大夫文化的发展与嬗变	160
第二节 层间文化互动	177
一、从官方的文化推动到民间的文化流动	178
二、明代文化的民俗化	183
第四章 教育与考试制度	191
第一节 教育制度	192
一、民间教育	193
二、官办学校——府、州、县儒学	199
三、官办学校——国子监	210
四、书院教育	221
第二节 考试制度	228

一、岁试与科试	229
二、乡试、会试、殿试	233
三、“八股文”与分卷制度	242
四、科场事例	247
第五章 学术流派与宗教	253
第一节 从明初到明前期的理学	255
一、明初的理学	255
二、明前期理学的重兴	262
三、“江门之学”与“余干之学”	268
第二节 明中期的心学	271
一、湛若水与“江门学派”的发展	272
二、王守仁与“姚江之学”	276
三、王学的各派	280
第三节 明后期的实学与反理学思潮	286
一、泰州学派	286
二、反理学的学术思潮	292
三、东林书院与明末的理学	296
第四节 明代的宗教	300
一、佛教	301
二、道教	307
三、民间宗教	312
四、天主教的传入	316
第六章 文学艺术	322
第一节 文学	322
一、诗文与流派	322

二、话本与小说	333
第二节 戏曲	345
一、杂剧	347
二、传奇戏	351
第三节 音乐与舞蹈	358
一、宫廷乐舞	358
二、民间音乐舞蹈	362
三、朱载堉与《乐律全书》	365
第四节 美术	368
一、明代的宫廷院体画	368
二、“浙派”与“江夏派”	372
三、“吴门四家”	374
四、晚明的绘画	377
五、民间美术	380
六、书法	382
第七章 文化遗产——修书、刻书与藏书	386
第一节 明代的官私书籍	386
一、明代的官修书籍	387
二、私人著述	400
第二节 刻书与藏书	414
一、明版书籍	414
二、明代的官私藏书	423

导 言

对于文化史，我是素感兴趣的。先师国桢教授对于明清文化的造诣之深，学界所共知，我的同门任道斌君颇承先师的教诲，在明清文化研究方面著述甚丰，本更当承此重任，但道斌君因另有国家重点项目之任务，无暇旁顾，我于是只有勉力而为了。

对于我来说，虽勉力而作此《明代文化志》，却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既感到难于把握对文化的界定，又感到难于把握作志的体例。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文化的概念仍然各执己说，莫衷一是，定义数以百计，令人望而生畏，拟目的时候不知从何下手。只得找来诸学者之论反复拜读，渐感其实说及文化之大端，许多都是为人所共识的东西。这就如我们自幼所读文化课一样，其范围可大可小，其内容可多可少，入其范围者自是文化无疑，未入其范围者，亦未必不是文化，只是视其所划定的范围大小而区别论之罢了，而范围的划定也正是学者们著述的各自特点。这也许更接近于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弹性定义，我之所以同意这样的看法，也算是在文化志写作时为自己找寻一点合理成书的理由吧。

我本来想，作为文化志，按道理讲述事应当力求全面。志者，记也。既称之为明代文化志，当记述有关明代文化的事情，门类似不应有缺。但到实际操作时，方知不可能求全无缺，这一则是本人能力所

限,二则也是全书的篇幅所限。这于是便牵扯到志书的体例,究竟如何算是文化志的体例,以我的浅学陋识,实在是不敢侈谈的。只是出于操作之便,将明代文化分作两方面内容来叙述,一方面依现象分述而力求突出其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方面依门类分述而力求其全。这本不成样子的《明代文化志》便这样开始着手写作。写写停停,前后两三年的时间,待到完成大部分书稿时,回头来看,连自己也感到近于史而疏于志,却又无力作大的改动,只能期待读者的批评。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明代的文人与文化趋向

一、元末明初的学风

文化的特点是一个时代的特点。任何历史现象都可以透过文化现象得到准确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明代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一部明代史，而且是一部更为生动的明代史。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般来说，文人士大夫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主流，他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但是同时又对社会趋向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这便是一些学者经常谈到的学风。学风也就是时代风气，或者说是上层文化的风气，它推动着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发展。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登极称帝，建立起大明帝国的时候，就在距南京并不很远的松江府(今属上海市)，一位名叫杨维桢的元朝遗逸与当时文坛的名流们正在醉生梦死中享受着依然旧日的生活。史书中记述说：

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

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明史·杨维桢传》）

一边是太祖与开国功臣们用刀剑建立的强有力的君主专制政权，一边是旧式文人士大夫的茫然颓废，他们甚至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新朝的建立。这两种格格不入的文化追求，就构成了明初文化的特点。

作为开国皇帝，明太祖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因此网罗文学儒臣便成为其建国求治的重要手段。明朝人对于太祖的“文治”是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的：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涣乎成一代之宏规。……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明史·儒林传序》）

所说虽然均属实事，但其中颇多美化的成分，因为在太祖有意宣扬这种文治大兴的盛世的时候，那些文学之士们却并非心甘情愿地林立于其朝右，而那网罗硕学的举动，实际也只是太祖一厢之愿。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征召诸儒修纂礼乐书籍，以杨维桢前朝老文学，特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绝道：“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次年，再遣官敦促，维桢则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奉，且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明太祖无可奈何而许之。赐安车接至朝中，留一百一十日，待纂叙例略定，仍给安车送还。朝中儒臣设帐西门外，为之饯行。翰林学士宋濂赠诗云：“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直至白衣还。”（《明史·杨维桢传》）

这次网罗与反网罗的斗争，虽然以双方的让步而暂时得到解决，但是问题已经明显暴露出来了，杨维桢不肯受诏，以及朝中儒臣对于他这一举动的赞誉，说明当时在太祖所建立的政坛之外，实际存在着